



中国美术研究

Research of Chinese Fine Arts

第15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

艺术·和平·友谊——张书旂的艺术人生

陪都时期重庆美术展览会研究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公园收藏犍陀罗造像

泸州与昭通东汉陶灯座佛像比较研究

清代前期宫廷西洋肖像画研究

潘玉良人物画中线条特征的演变脉络

五体兼备 褒贬分明——论《画继》的写作

体例与方法

身份焦虑与“中国画”的自我辨识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清代油画《西洋少女像》



林呱《西洋少女像》 亚麻布油画 纵26cm×横21cm 约1835年
银川当代美术馆藏

此件《西洋少女像》作者关乔昌(约1803—1860年),广东南海人,洋人称之为“Lamqua”,译成中文为“林呱”。作为侨居澳门的英国古典油画画家乔治·钱纳利的高足,林呱(关乔昌)师承钱纳利西洋画创作方法,致力于西洋绘画中人物立体解剖结构的运用,擅长英国学院派古典肖像“华丽样式”的技法,以深底色作为背景,衬托人物皮肤的白皙,使得黑白与彩色的颜色对比强烈而明快,无论在创作方法以及创作题材上都残留模仿钱纳利肖像画的创作风格,成为中国清代以古典肖像油画而著称的画家。

画家采用西方古典肖像画戏剧性用光,将光线投影在了少女的头部,背景下半部留下的光线打在人物头部的阴影上,人物衣服和背景交界处处理成深褐色,增强了画面空间的深度;在色彩的运用上,深色调的背景衬托出少女肤质的光鲜及衣物的靓丽,蓝色围巾包裹着少女的肩和胸部,凸显出少女的风韵,也映衬出细腻光滑的肌肤。林呱采用钱纳利惯用的人物脸部的描绘方式,面颊施以红晕,嘴上勾勒红唇,少女肤质白里透红的鲜嫩,展现出人物血气饱满、精神的一面,并通过蓬松卷曲的棕褐色头发的描绘,表现少女活泼、纯真的神情。从画面背景处理手法的运用看,他已熟练地掌握了西方古典油画表现技巧,应是林呱中年时期的作品。此外,作品背面拍卖记录标签明确标明,这幅油画肖像的作者是画家“林呱”。(此幅油画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胡艺应银川当代美术馆邀请赴银川对原作进行鉴定后所撰写的鉴定文稿)

导 读

在浓浓的秋意中，我们的系列研究迎来了第15辑。为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本辑隆重推出“抗战美术研究”专栏。《艺术·和平·友谊——张书旂的艺术人生》一文追忆了张书旂这位在抗战期间蜚声中国画坛的和平战士。《宣传画〈中国境内的日军全部投降在南京签字〉创新性研究》一文，通过对这幅重要作品的纪实性、连续性、历史性与纪念性的分析，使我们重温了这段难忘的历史。在《陪都时期重庆美术展览会研究》中，作者对1938年至1946年间《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刊载的美术活动进行了梳理，从美术展览会的发展演变、分期和分类展开，揭示了中华民族在时代的阵痛中艰难前行的历史。本辑谨代表美术学研究阵地，向70年前用美术作为武器、振奋国民精神、永不言弃的艺术斗士们致敬！

“佛教美术研究”栏目是本辑重点。首篇文章中，著名佛教艺术史家栗田功对十七尊犍陀罗造像进行了细致的图像志研究。这些佛像已经被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公园收藏，这是中国的博物馆界进军佛教造像源头收藏的一次壮举。《泸州与昭通东汉陶灯座佛像比较研究》一文，通过图像的比较与阐释，结合中印莲花形象，指明了二者在早期佛像研究中的重要性。另外两篇文章，分别对初唐时期龙门石窟中同茎莲花座与15世纪藏西地区托林寺红殿与白殿女性题材绘画进行了解读，尝试探讨了其图像学的来源与意义。

“美术史研究”栏目中，《清代前期宫廷西洋肖像画研究》一文探讨了清代前期宫廷西洋肖像画的发展与中西绘画的交流和融合。《神圣与世俗：乾隆皇帝佛装画像研究》则从政治与美术的关系入手，关注了乾隆、雍正、慈禧等清代统治者的佛装画像的图像表现、发展与意义。后两篇文章，一篇关注了当代艺术中的女性自恋情结的后现代话题，另一篇则从汉墓多枝灯与宗教法器的关系出发，条分缕析地阐明了宗教艺术对汉代多枝灯功能的继承。

“近现代美术研究”栏目分别介绍了民国时期水彩画在出版物中的运用、潘玉良的人物画线条特征的演变脉络与云南艺术家蒋雪峰的艺术世界。

“画论研究”栏目则收录了两篇理论文章。其一通过对《画继》的写作体例与方法的探究，揭示了其纪传体画史的学术贡献。其二通过对《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近代之画”的对应画家探析，对张彦远“近代之画，灿烂而求备”的本意进行了推断和论证。

“美术馆与艺术市场研究”栏目的文章包含了对“翰海”拍卖历史沿革、运营状况的考察与分析，以及对龙美术馆红色题材美术作品的收藏与展示的研究。

“艺术批评与书评”栏目中，《身份焦虑与“中国画”的自我辨识》一文，强调了习画者不应受限“中西”与“古今”之别，而应采取开放式的视觉体验，塑造个性。两篇书评则对《中国美术史中的语图关系研究》和《中国漆艺美术史》两部著作进行了评述。

本辑“美术名家馆”栏目推介“刘海粟美术馆”，刘海粟美术馆新馆将于今年底向公众隆重开放。

刘海粟作品选



图1 巴黎圣母院夕照 布面油画 116.5cm × 89cm 1930年
刘海粟美术馆藏



图2 比利时鲁汶圣比得教堂 布面油画 100cm × 74.3cm 1930年
刘海粟美术馆藏



图3 黄海一线天奇观 纸质国画 69.2cm × 134.1cm 1976年 刘海粟美术馆藏

[画论研究]

张同标 主持

五体兼备 褒贬分明——论《画继》的写作

体例与方法 刘世军 112

《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近代之画”

的对应画家探析 于献堂 117

[美术馆与艺术市场研究] 李万康 主持

抚今追昔观“翰海” 继往开来看拍卖 石婷婷 122

龙美术馆红色题材美术作品的收藏与

展示研究 蔡璐瑛 128

[艺术批评与书评]

身份焦虑与“中国画”的自我辨识 杭春晓 137

美术史研究的“语-图”关系范式

——评《中国美术史中的语图关系研究》 赵敬鹏 141

《中国漆艺美术史》体例研究 韩延兵 144

[美术名家馆]

刘海粟美术馆 149

清代油画《西洋少女像》 封二

刘海粟作品选 封三

刘海粟《重彩荷花》 封底



封面图版说明

本尊为结禅定印趺坐的白色膏泥佛陀像。该佛像保存基本完好,根据佛的大小,推测该造像应该有一个50cm左右高度的莲花座。石膏技法是公元2世纪后半叶至3世纪初期自罗马传到犍陀罗的一种技术手段,此手法尤其在阿富汗的哈达以及巴基斯坦的塔克希拉地区尤为兴盛。有观点认为犍陀罗并不出产优质石材,因此利用石膏来代替石材是该艺流传的原因。不过犍陀罗地区也有石质雕刻出土,由于石膏的优良特性使得犍陀罗地区的人们乐于接受这一新兴材料。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石膏造像也有着些许区别。哈达的造像脸较长而塔克希拉的造像则偏圆。本尊造像出土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的中间地带。

(栗田功)

《中国美术研究》启事

1. 《中国美术研究》由文化部主管下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教育部主管下的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联合创立。作为美术学研究的专业科研单位所主编的专业学术研究系列,我们将本着学术至上的原则,精心策划艺术专题,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和学术新秀撰写稿件,立足于对中国美术学科开展全面研究,介绍最新学术理论研究成果,展示优秀艺术作品。

2. 本研究系列为每季1辑,自2006年9月创立以来,已经发行27辑,在学术界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2012年起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3. 本研究系列设定主要栏目有:民国美术研究、新中国美术研究、美术考古研究、宗教美术研究、美术史研究、美术批评与理论、焦点热点、美术史学史、美术教育、艺术市场、博物馆美术馆研究等。竭诚欢迎投稿。投稿邮箱79813529@qq.com。

编辑部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干训楼605室)

联系电话:021—52137074

邮编:200062

欢迎阁下赐稿!尊文如被采用,我们将略付稿酬。

《中国美术研究》编辑部

导 读

在浓浓的秋意中，我们的系列研究迎来了第15辑。为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本辑隆重推出“抗战美术研究”专栏。《艺术·和平·友谊——张书旂的艺术人生》一文追忆了张书旂这位在抗战期间蜚声中国画坛的和平战士。《宣传画〈中国境内的日军全部投降在南京签字〉创新性研究》一文，通过对这幅重要作品的纪实性、连续性、历史性与纪念性的分析，使我们重温了这段难忘的历史。在《陪都时期重庆美术展览会研究》中，作者对1938年至1946年间《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刊载的美术活动进行了梳理，从美术展览会的发展演变、分期和分类展开，揭示了中华民族在时代的阵痛中艰难前行的历史。本辑谨代表美术学研究阵地，向70年前用美术作为武器、振奋国民精神、永不言弃的艺术斗士们致敬！

“佛教美术研究”栏目是本辑重点。首篇文章中，著名佛教艺术史家栗田功对十七尊犍陀罗造像进行了细致的图像志研究。这些佛像已经被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公园收藏，这是中国的博物馆界进军佛教造像源头收藏的一次壮举。《泸州与昭通东汉陶灯座佛像比较研究》一文，通过图像的比较与阐释，结合中印莲花形象，指明了二者在早期佛像研究中的重要性。另外两篇文章，分别对初唐时期龙门石窟中同茎莲花座与15世纪藏西地区托林寺红殿与白殿女性题材绘画进行了解读，尝试探讨了其图像学的来源与意义。

“美术史研究”栏目中，《清代前期宫廷西洋肖像画研究》一文探讨了清代前期宫廷西洋肖像画的发展与中西绘画的交流和融合。《神圣与世俗：乾隆皇帝佛装画像研究》则从政治与美术的关系入手，关注了乾隆、雍正、慈禧等清代统治者的佛装画像的图像表现、发展与意义。后两篇文章，一篇关注了当代艺术中的女性自恋情结的后现代话题，另一篇则从汉墓多枝灯与宗教法器的关系出发，条分缕析地阐明了宗教艺术对汉代多枝灯功能的继承。

“近现代美术研究”栏目分别介绍了民国时期水彩画在出版物中的运用、潘玉良的人物画线条特征的演变脉络与云南艺术家蒋铁峰的艺术世界。

“画论研究”栏目则收录了两篇理论文章。其一通过对《画继》的写作体例与方法的探究，揭示了其纪传体画史的学术贡献。其二通过对《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近代之画”的对应画家探析，对张彦远“近代之画，绚烂而求备”的本意进行了推断和论证。

“美术馆与艺术市场研究”栏目的文章包含了对“翰海”拍卖历史沿革、运营状况的考察与分析，以及对龙美术馆红色题材美术作品的收藏与展示的研究。

“艺术批评与书评”栏目中，《身份焦虑与“中国画”的自我辨识》一文，强调了习画者不应受限“中西”与“古今”之别，而应采取开放式的视觉体验，塑造个性。两篇书评则对《中国美术史中的语图关系研究》和《中国漆艺美术史》两部著作进行了评述。

本辑“美术名家馆”栏目推介“刘海粟美术馆”，刘海粟美术馆新馆将于今年底向公众隆重开放。

[画论研究]

张同标 主持

五体兼备 褒贬分明——论《画继》的写作

体例与方法 刘世军 112

《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近代之画”

的对应画家探析 于献堂 117

[美术馆与艺术市场研究]

李万康 主持

抚今追昔观“翰海” 继往开来看拍卖 石婷婷 122

龙美术馆红色题材美术作品的收藏与

展示研究 蔡璐瑛 128

[艺术批评与书评]

身份焦虑与“中国画”的自我辨识 杭春晓 137

美术史研究的“语-图”关系范式

——评《中国美术史中的语图关系研究》 赵敬鹏 141

《中国漆艺美术史》体例研究 韩延兵 144

[美术名家馆]

刘海粟美术馆 149

清代油画《西洋少女像》 封二

刘海粟作品选 封三

刘海粟《重彩荷花》 封底



封面图版说明

本尊为结禅定印趺坐的白色膏泥佛陀像。该佛像保存基本完好，根据佛的大小，推测该造像应该有一个50cm左右高度的莲花座。石膏技法是公元2世纪后半叶至3世纪初期自罗马传到犍陀罗的一种技术手段，此手法尤其在阿富汗的哈达以及巴基斯坦的塔克希拉地区尤为兴盛。有观点认为犍陀罗并不出产优质石材，因此利用石膏来代替石材是该艺流传的原因。不过犍陀罗地区也有石质雕刻出土，由于石膏的优良特性使得犍陀罗地区的人们乐于接受这一新兴材料。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石膏造像也有着些许区别。哈达的造像脸较长而塔克希拉的造像则偏圆。本尊造像出土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的中间地带。

(栗田功)

《中国美术研究》启事

1. 《中国美术研究》由文化部主管下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教育部主管下的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联合创立。作为美术学研究的专业科研单位所主编的专业学术研究系列，我们将本着学术至上的原则，精心策划艺术专题，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和学术新秀撰写稿件，立足于对中国美术学科开展全面研究，介绍最新学术理论研究成果，展示优秀艺术作品。

2. 本研究系列为每季1辑，自2006年9月创立以来，已经发行27辑，在学术界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2012年起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3. 本研究系列设定主要栏目有：民国美术研究、新中国美术研究、美术考古研究、宗教美术研究、美术史研究、美术批评与理论、焦点热点、美术史学史、美术教育、艺术市场、博物馆美术馆研究等。竭诚欢迎投稿。投稿邮箱79813529@qq.com。

编辑部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干训楼605室）

联系电话：021—52137074

邮编：200062

欢迎阁下赐稿！尊文如被采用，我们将略付稿酬。

《中国美术研究》编辑部

艺术·和平·友谊

——张书旂的艺术人生

凌承纬

(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 400053)

【摘要】20世纪30年代,张书旂就曾以其融汇中西的画风蜚声中国画坛,与徐悲鸿、柳子谷一起被誉为“金陵三杰”。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他随中央大学西迁到重庆,一方面教书育人,传授艺术;另一方面积极投身大后方的抗战文化活动,创作了《百鸽图》等作品赠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等盟国国家元首,社会影响很大。后来,他又远赴北美,宣传中国文化艺术,举办画展筹款支援国内抗战事业。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文化使者与和平战士,他为发展中国绘画艺术,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世界各国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和支援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立足史料的收集、梳理和研究,揭示这位杰出的却一度被国内美术学界所忽略的中国画家的艺术人生。

【关键词】艺术大家 和平卫士 文化使者

作者简介:

凌承纬,四川美术学院中国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所所长、教授,重庆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国抗战大后方美术史。

张书旂是民国时期一位社会影响很大的中国画家。其影响不啻在艺术领域,更在于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传播中国文化艺术,推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等方面。由于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就离开了中国,去世也比较早,留在国内的作品不多;加之国内艺术学界关注不够,对他的研究也就显得比较薄弱。伴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和他的艺术几乎要淡出国人的视线。1997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名为《张书旂百鸽图》的画册。画册由著名画家方增先作序。其中收入了张林岚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被遗忘的鸽子》。2011年,北京大学丁宁教授翻译了张书旂先生的哲嗣、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张少书的文章《进入美国的中国画:张书旂及其艺术外交》。丁宁在译文前的按语中称:“张书旂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被过于忽略的重要的中国画艺术家。”

我们对张书旂的研究是基于自2008年以来开展的《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正是这项被列为重庆市重大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推进,让我们在掀开尘封了70年的历史时再次认识张书旂和他的艺术。2012年5月,重庆市举办了“张书旂中国画艺术及其传承作品展”,展出了张书旂家人和国内外艺术机构提供的张书旂的作品120余幅。同时,举办了“张书旂中国画艺术国际研讨会”,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由始我们对这位曾“被过于忽略”的杰出艺术家的艺术人生有了比较深入

的认识。

一、优秀的中国画家

已故著名画家唐云曾评论张书旂说:“书旂乃开派画家,能开派的历史上没有几人,其画才与徐悲鸿在伯仲之间。”言简意赅,一句话把张书旂的艺术造诣、对中国画发展的贡献以及在现代中国画史上的意义都说到了。

张书旂1900年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长张村,自幼热爱美术和生机盎然的大自然,少年时代就显露出过人的绘事潜质。在金华读完中学后,他曾回到家乡一所小学教书,俟后受聘于母校金华七中教授图画课程。1922年赴沪求学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在这所当时不多的具有现代美术教育理念的学校,张书旂接受了包括素描、写生、构图、色彩等一套西洋美术的教育。同时他又求学于时任该校教授的吕凤子门下,学习中国画。吕凤子原本接受的是原南京两江优级师范范围工科的“中西合璧”式的美术教育。这种受教于日本教师的“中西合璧”与徐悲鸿等取法欧洲学院派绘画后倡导的“中西合璧”从观念到形态上均有不同,如素描不以光影造型为主旨而是以线条的讲究和表现为要津。显然,看张书旂以后艺术的发展和绘画风格的形成,是与他早期所受教育特别是吕凤子的影响不无关系的。既有西画的素描、色彩、透视、写生的功底,又学习并建立了以注重线条为主这种与中国传

统线描绘画有相通之处的造型观念和能力。这成为张书旂日后艺术风格形成的出发点。

唐云所说的绘画上的“开派”，主要是指开拓并建立一种绘画的风格和形态。也就是说自立门户，创建一种从观念到形式都有别于其他的绘画。至于张书旂的“开派”是始于什么时候，恐怕很难论断，然而，我们却可以说，正是他的绘画所具有的独特风貌打动了徐悲鸿，从而改变了他的艺术人生。1926年后，张书旂应聘福建厦门集美学校（后改为厦门大学）任教。1929年夏，福州举办福建全省美术展览，并邀上海等地名家作品一同展出。展览规模空前，社会影响很大。张书旂有多件作品参展，引起观众普遍好评。恰时，徐悲鸿应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黄孟圭邀请来福州游览，在展览上见到张书旂的作品，大为赞赏，即由主持中央大学中国画教学的吕凤子延聘他到中央大学任教。五年后，张书旂在南京举办个人展览，徐悲鸿发表文章《张书旂画伯》，其中写到1929年他在福州美术展览上见到张书旂作品的情况，他说：

“张先生书旂，时授厦门，亦有多量作品参与。其风爽利轻快，大为人所注意。旋即应聘来中央大学，益勇猛精进，作品既丰，领域日广，嗣是国内外一切有关近代美术之展，靡彼不与，且所为人注目。”^[1]

以上可见，此时张书旂绘画“爽利轻快”的风格已经形成，且为徐悲鸿所首肯。

1930年春，张书旂赴南京任教中央大学艺术系。其时，艺术系主任为李毅士，后由徐悲鸿继任。由于此间中国的美术教育模式已经开始从绘画、制图、手工并重转向以绘画为主。中大艺术系与时俱进，广泛罗织人才，汇聚起了以李毅士、徐悲鸿、潘玉良、陈之佛、吕凤子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绘画领域的精英。张书旂由厦门来到首都，生活条件和创作环境都大为改观，艺术同道增多，文化视野拓宽，心情尤为舒畅，精神焕然一新；加之他心胸开朗，为人坦诚，善交朋友，身边文人雅士云集，艺坛高手不乏。这对他的艺术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1932年，由杭州国立艺专的潘天寿发起，南京中央大学的张书旂，上海美专的吴弗之、诸闻韵（兼新华艺专教授），上海艺专的张振铎五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教授参加，成立了美术社团“白社”（“白社国画研究会”），提出继承文人画的优秀传统，以“扬州画派”的革新精神开拓中国画的发展。“白社”曾先后在沪、宁、杭举办画展，出版《白社画册》。张书旂一方面敬业教学，培育学子，另一方面孜孜以求，专研绘事。如张振铎所言：“书旂作画，无问寒暑，不拘昼夜，伏案挥毫，习以为常，努力猛进，实所仅见。”他的艺术日渐精进，品质不断提升，以花鸟画为其主要内容的艺术风格日渐成熟。

1935年11月，《张书旂先生画展》在南京中山北路首都华侨招待所举行。执教中大艺术系五年，由讲师递升为教

授，这次展览成为他艺术生涯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出展的两百余件作品显示了他绘画的基本审美取向和艺术形态：以花鸟为主，山水次之，人物点缀，小写意画风，构图简约协调，色彩清丽明亮，技法娴熟精到，状物造像基于写生，透发着鲜活的生命力。这次展览引起首都社会各界人士关注，文化艺术领域反应强烈。《艺风》月刊第三卷第十一期特发专辑介绍张书旂其人其艺。许耀卿写画家小史，罗家伦、徐悲鸿、马叙伦、陈树人、李清悚等名人题写书条祝贺，徐仲年、陈之佛、吴弗之、张振铎、李毅士、何炳松、李金发、许士骐、汪亚尘、吕斯百、王祺等诸多文化艺术界人士撰文高度评价他的艺术（图1）。这次画展的成功，不但显示了他在中国画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而且也确立了他的艺术特别是花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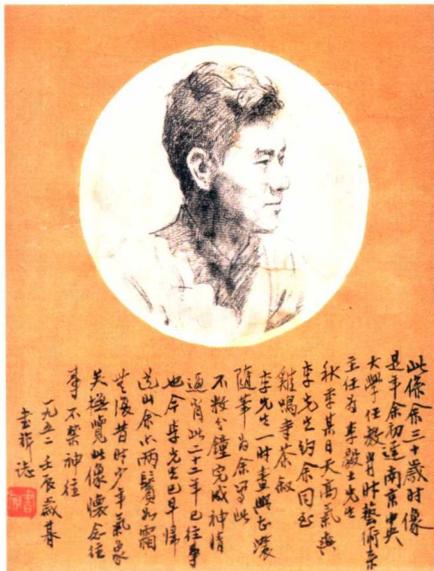


图1 1929年李毅士为张书旂画的速写

画在当时中国画坛上的地位。吕斯百在撰文中写到徐悲鸿对中国近代画在世界艺坛上所居地位的评价中，肯定了齐白石、张书旂、陈树人、张大千等几位花鸟画家的贡献；然后说：“一九三三年巴黎开中国画展的结果，张书旂的花鸟，也走进了国际美术馆，登世界艺坛之门，为国争光，同时固定了他在近代画家中的立场。”

纵观张书旂的艺术生涯和绘事前行的轨迹，对他在近代花鸟画发展中的“开派”，以及取得的艺术成就，似可以从三个方面追溯和认识：基于生活之上的创造、基于传统之上的创新、基于写实之上的写意。

张书旂在上海美专原本是学西画，后改学中国画并选择花鸟画为其主攻，其缘由可追溯到他幼年时的生活。浙江省浦江县是一个风光优美、殷实富庶的地方。他的家乡礼张村更是一块山清水秀、安谧祥和的土地。村前小河，屋后修竹，湖光山色，四季如画。张书旂以上三代均为教书人，虽为书香门第却一直生活在农村之中。礼张乡间纯朴本然的民风，丰富多彩的生活，深深吸引了年幼的张书旂。他尤其感兴趣于生活中那些荡漾着生命活力的情景：枝头上欢叫的麻雀、云端处翱翔的苍鹰、溪水中悠闲的游鱼、荷塘边休憩的大雁、树枝下觅食的小鸡、草丛中鸣叫的蟋蟀、山坡上盛开的野花、篱墙边娇艳的牡丹、风雨中摇曳的斑竹、山石上苍劲的松柏、安静的家猫、吠叫的小狗……据说，在他十一岁时曾经画过一只翠鸟，

其凝神专注的样子十分生动有趣，被通诗文懂书画的叔父看见，大为惊异，遂鼓励他习画。幼年张书旂受到鼓舞，愈加喜爱描摹乡间生活中那些俯拾皆是的无数生机盎然的美好。

如果说是来自现实生活的激励，对大自然和生命的热爱，奠定了张书旂立足于写生的花鸟画创作方式的感情基础，那么正是古往今来几位与他有相同审美取向的前辈大家的艺术理想和创作实践成为他艺术前行的指引。

张书旂被画坛称为是继任伯年之后又一位有成就的立足于写生的花鸟画家。其实，他的艺术还可以追溯到北宋花鸟画家赵昌和易元吉那里。在重彩厚色画风盛行之世，赵昌的艺术独树一帜，其明润匀薄、活色生香的气象就是立足写生之上的作为；而易元吉笔下以獐猿为代表的动物、花鸟的生动造像也是从写生出发的。张书旂十分尊崇并重视学习传统，还先后研究过黄荃、徐熙、陈洪绶、八大山人的绘画，以至追随过吴昌硕的画风。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任颐和潘椒石的画路。兴许是在一派尚意尚逸的文人画风中，任颐注重自然和写生，其画笔下流淌出的清新活泼在张书旂的心中激起了波澜；也兴许是任颐基于民间绘画功底的创造所表现出的机巧风趣让他别开生面。张书旂也非常喜爱比任颐稍后一点的潘椒石的艺术。潘椒石也是一位注重写生，愿为花鸟传神而“管秃、缣腐、腕脱、指胼者不知几易寒暑”的画家。任颐、潘椒石的花鸟画创作走的都是小写意画路，崇

尚自然，注重写生，画中也都善用白粉。这在张书旂的画中可清晰地看到他们艺术的影响。张书旂对白粉的运用和讲究甚至超过前辈，吴弗之说他是“大用特用白粉，且以极苍劲秀润之笔出之，纸与粉而相映成趣，粉因笔而风雅宜人，一种富丽堂皇之气概，奔赴腕下”。故冠之以“白粉主义画家”的称呼（图2）。

当然，曾自诩是“拳棋牌箫酒，天下无敌手”的性情中人张书旂不会因循前人足迹亦步亦趋。时改景迁，世事迥然，加之自己文化、学养、性情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张书旂笔下自然是另外一番景象。徐悲鸿评价张书旂说：“张君尊伯年先生，早期所写不脱山阴窠臼，五年以来刻意写生，自得家法，其气雄健，其笔超脱，欲与古人争一席地，而为当代代表作家之一。”吴弗之撰文道：“张君治画多年，每忘寝食，纵远



图2 张书旂在创作中

追复堂，近师伯年，而平日取法写生，尤能以造化为归，故所作人物山水，均能妙造自然，而花卉翎毛，尤觉栩栩欲活。形神俱至，盖优游于古人法度中，却能自辟门户者。”我想，这就成其为“开派”一说了。

比较任、潘的艺术来看，张书旂的绘画似乎更倾向于立足自然的状写，而少一些出自主观的构成，更热衷于生活色彩的表现而少一些笔墨意趣的追求。但这并不是说张书旂不在意画面的经营和笔墨的讲究。事实上，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协调的物景布承和精彩的线的施用。在他的作品中，有赖于整洁简约的画面和干净纯粹的墨色所呈现出来的清爽和雅致往往给人带来一种赏心悦目的美意。有人说这是受日本画和岭南画派的影响。看到张书旂的许多画在熟纸、矾绢上的作品，尤其后来他到美国在一种有色纸板上作的画之后，我想这是不无道理的。看来，张书旂在承接传统和借鉴他人艺术方面真是一位能博众家之长而铸就自己的高手。毋庸讳言，业内也有人认为张书旂的作品缺少中国绘画所讲究的神韵和意境，缺少书卷气。我想，如果不拘泥于传统文人画的角度，不固守对神韵、意境的素有认识，兴许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张书旂的艺术会得到包括许多老一辈艺术家在内的业内诸多首肯。李金发说：“张先生的作风，既不是新派，又不是老调，如玉树临风，独创一格！”许士骥评价张书旂：“以自然为规范，处异说争鸣的上海，纷纭庞杂的派别，屹不

为动，所写花鸟，笔简意工，穷自然的极致，设色用墨，独出机杼，而风韵孤标，处处能表现国画上的新生命。”汪亚尘也说：“书旂采任潘之特长而不落两氏之窠臼，加以自然的观照，融和自己的心灵，更能另创一格，实为目前改进国画的先锋。”^[2]看来，已经作古的老一辈艺术家对张书旂的艺术尤其是“独创一格”的“开派”作为是赞赏有加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张书旂的艺术不仅受到中国民众的广泛喜爱，也受到诸多西方人士的尊崇。

二、世界和平的卫士

如前所述，我们对张书旂的研究是始于几年前开展的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众所周知，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严峻时代，大后方美术领域中最活跃、最具有战斗性的是版画和漫画。我们把它们称之为抗战美术运动的两支冲锋队和主力军。由于诸多原因所致，尽管中国画和油画等在抗日救亡斗争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不及版画和漫画，但也仍然做出了不可小视的贡献并有所作为。其中最凸显的事例就是张书旂创作《百鸽图》赠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以及由这件事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张书旂创作《百鸽图》赠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一事，历史以来国内许多报纸杂志都曾载文论及，几乎只要谈到张书旂就要提及这件事，谈到抗战时期大后方艺术家的贡献就要提到这件

事。因为这确实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和中外艺术史上不多见的事；是中国艺术家以艺术的方式维护正义与和平，反对邪恶与战争的一次载入史册的精彩作为。然而，我们在查阅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发表的许多谈及这件事的文章时，发现在对这件历史往事的基本认同下，有诸多史实不清楚的地方乃至有多种说法。于是，我们着手查阅、收集抗战时期张书旂在重庆的第一手史料，基于史料的稽考、梳理和研究，基本上弄清了《百鸽图》创作、赠送给罗斯福总统，以及其他相关历史情况。（关于《百鸽图》相关史实的稽考和研究情况将另文论述）

武汉会战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为“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政府屈服，达到“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目的，自1938年底开始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实施战略轰炸。轰炸逐渐升级，1940年5月以后，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协同作战，执行所谓“101号作战”计划，对重庆及周边地区实施连续三个月残酷的无差别大轰炸。山城几乎每天都陷于硝烟火海之中，无数平民百姓被炸死炸伤，无数建筑设施被摧毁。此间，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科教授的张书旂住在重庆市郊的沙坪坝。该地区作为重庆的文化区遭到日机轮番猛烈轰炸，尤其在5月29日、6月下旬，以及7月5日的多次大轰炸中，损失十分惨重。张书旂目睹日军的凶残暴戾和不可一世，眼见硝烟中的断垣残壁和死伤民众，无不义愤填膺。他想到，作为一个艺术家

应该有所作为，以自己的艺术为中国的抗战做出贡献；中国目前急需得到来自国际上特别是高处战争之外的美国的同情和支援。由是他萌生一个想法，以鸽子为对象创作一幅呼吁世界和平的中国画，赠送给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人。他的这个想法得到友人、同为中央大学教授的宗白华和方东美的赞同，并竭力支持他创作这幅画。以写生见长的张书旂随即从附近的古镇磁器口买来数只鸽子，天天观察鸽子的各种姿态和动作，熟记于心，然而数十天过去却未动笔落墨。直到11月5日，从美国传来第32任总统、民主党人罗斯福竞选第三次连任成功的消息，张书旂感叹道：“此画有主了！”随即构图，作画。按当时报纸记者采访张书旂所描述《百鸽图》的创作过程：“这一大幅，四天中完成，但构思了三个星期，第一天画了五十只，第二天又画了五十只。但数来数去朋友说少了三只，因之第三天添了

最后三只大的，第四天是完成树与花的配景。”

《百鸽图》是1940年12月23日在重庆嘉陵江畔的一家宾馆内举行的赠画仪式上由张书旂交给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的（图3）。赠画仪式是在张书旂为以张自忠将军名义设置的奖学金募集资金而举办的一次画展的预展中进行的。由于两项活动都引人注目，吸引了重庆许多家报馆的记者前来采访，社会影响自然也就大了（图4）。赠画仪式由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主持，邀请的客人除了美国大使约翰逊以外，还有英国大使卡尔和两国大使馆参赞人员。中国方面作陪的有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和重庆市长吴国桢等，宾主共约百余人，场面十分隆重。有当地报纸刊载《百鸽图赠送记》一文对赠送情况作了十分详细的报道：

“张书旂画的百鸽图，昨天在中

大罗校长举行的盛大茶会上，交给了美大使转寄白宫罗总统……百鸽图卷作丈余长的一轴摆在中间长桌上，罗校长主席居中，美大使及作者张书旂教授左右立，开始举行赠画仪式了，罗校长致辞说明庆祝罗总统三届连任，赠送和平之鸟的意义，为着达到世界和平，中美更须增进邦交。词毕，张教授尊重地拿起画来送到詹森（即约翰逊——本文作者注）大使的手里。大使表示至深的谢意。在辉煌的水银灯照耀之下，大使将画展开，孔院长帮着挂上正壁，大家一致注视着看啊！在相思树下、杜鹃花上那大大小小各种姿态飞翔着的白鸽整整一百。吃茶点间，张教授讲述了他作画的经过……摄影以志纪念后，詹森大使拿起这有历史意义的画幅上了汽车。”

关于蒋介石为《百鸽图》题字、罗家伦赋诗，以及运往美国的情况，此间报纸《和平之鸟飞入白宫》一文中记道：



图3 张书旂（右）请美国大使约翰逊（左）转赠《百鸽图》给罗斯福总统，中为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



图4 《百鸽图》赠送仪式合影（左起依次为王世杰、张书旂、约翰逊、罗家伦、卡尔、孔祥熙、王宠惠）

“中央大学艺术科教授张书旂，为庆祝美罗斯福总统第三届连任大典，增进中美邦交起见，特制《百鸽图》一巨幅，非常精彩，蒙蒋委员长赞许，亲题‘信义和平’四字，以颜其额，图中并由中大校长罗家伦氏题绝句一首云：‘拨乱犹余不世功，平章正义范群雄，会看寰宇休兵日，信使联翩绕白宫。’因鸽在西洋文学上代表和平，而百鸽系代表世界全面和平，为罗斯福总统抱负也……（《百鸽图》）由美大使詹森代表罗总统接受后，即将由飞剪号寄美，期于一月二十日寄到白宫，于就职典礼时可以悬挂，此不特为一极有意义之盛会，且系一时佳话。”

2011年12月，我们在位于美国纽约海蒂公园内的罗斯福图书博物馆里看到了保存十分完好的《百鸽图》——70年前由战火纷飞的重庆飞越太平洋来到白宫的一百只栩栩如生的“信使”。同时也查找到了当年张书旂写给罗斯福的信、约翰逊给罗斯福的信，以及罗斯福写给约翰逊委托他向蒋介石、罗家伦、张书旂致谢的信（图5）。

张书旂给罗斯福的信（译文）如下：

尊敬的罗斯福总统：

我非常荣幸能有此机会给您写这封信，并承蒙您的大使的好意请他转赠给您一幅由我创作的题为《世界和平的信使》的画。

我赠送给您这幅画，作为我对您、您的政府以及美利坚民族对中华民族一直怀有的深切同情的感激的象征。我想我是代表中华民族向您表达这份真挚的

感激之意的。

满怀敬意的张书旂

1940年12月23日

罗斯福给约翰逊的信（译文）如下（图6）：

亲爱的约翰逊：

我很有兴趣地阅读了您1940年12月24日的来信，以及随信寄来的一幅由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张书旂所作的中国画。对于张教授赠予我这幅画的好意，我表示由衷的感谢。蒋介石将军亲笔所题的画名，以及罗家伦博士为这幅画所作的诗使得这幅画更显珍贵。鉴于如此美好的赠予，请代我向蒋将军、罗博士以及张教授转达我的谢意，以及我收到这幅画的愉悦之情。

您真诚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签名）

1941年1月23日

2012年2月，美国罗斯福图书博物馆

收藏部主任米歇尔在给我的信中说，据该馆的记录，《百鸽图》在1941年1月运送到白宫，同年晚些时候送到纽约海蒂公园内的罗斯福图书博物馆收藏至今。1942年，该画曾由联合国中国救济基金会借出在纽约的Ferargil美术馆展览过，2008年至2009年曾送到旧金山的迪扬博物馆（De Young Museum）展出。

三、文化和友谊的使者

1941年4月29日，张书旂由重庆飞抵香港然后乘船转赴美国。出行前，中央大学艺术科的同学举行茶话会为他送行。张书旂以“艺术大使”的身份访问美国，目的是明确的：其一，传递中国人民的友谊，争取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与支援；其二，举办画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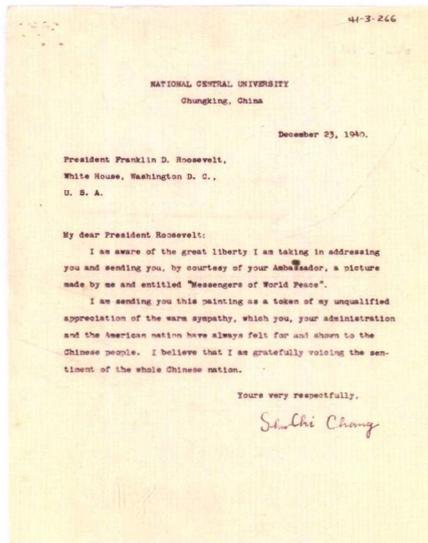


图5 张书旂先生给罗斯福总统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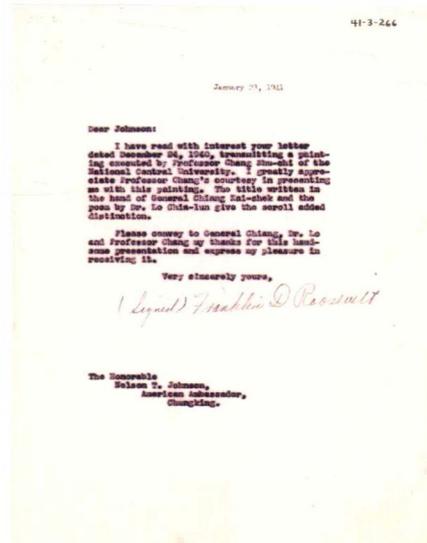


图6 罗斯福总统给约翰逊大使的信

和讲学，传播中国文化艺术；其三，售画，以其所得支援国内抗战事业。几个月前，他放出的一百只和平“信使”飞到了白宫；现在，他也将成为传送文化和友谊的使者东渡太平洋。

张书旂这次赴美得到行政院和教育部的资助。为减少国家负担，他在滞留香港期间举办了一个为期三天的画展，以卖画所得补贴访美经费不足。此间，他还应陈孝威将军之邀为英国首相丘吉尔创作了一幅《云霄一羽》图，并由被称为江东才子的杨云史配诗。《香港星期天信报》11月9日载文《一份赠予丘吉尔先生的中国礼物》，同时刊载了这幅画作和诗作。《云霄一羽》图现存丘吉尔故居查特韦尔庄园（Chartwell）。9月11日张书旂登上开往美国的轮船，10月初抵达美国旧金山，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北美之旅。

关于张书旂到美国后的情况，国内美术学界的人知道得不多。少量公开发表的文字虽然也有提及，但大多是浮光掠影式的描述。直到前年收到北京大学丁宁教授给我寄来的一篇由他翻译的，张书旂的儿子、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张少书的文章《进入美国的中国画：张书旂及其艺术外交》，联系我们在作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中对张书旂的了解，我才意识到，对张书旂以及他的艺术的忽略可能是中国美术学界一个不小的失误。2010年5月，经丁宁介绍我与张少书建立了联系，两年来，我们之间的电子邮件虽然也有数十封，但都没有比较具体谈到张书旂在美国的

情况。去年，张少书来信告诉我他正在写一篇介绍张书旂在美国的艺术生涯的长文章。前不久，我得到了这篇文章，题目是《跨越太平洋的艺术：张书旂在美国的绘画生涯》（Trans-Pacific Composition: Zhang Shuqi Paints in America）。我连夜捧读，尽管文章的中文翻译有明显的不足，但读完后依然令我唏嘘不已，夜不能寐！我终于明白丁宁所说“张书旂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被过于忽略的重要中国画艺术家”的含义！

张书旂是一位把毕生献给艺术与和平、中国与世界的艺术家。从张少书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至中年的中国画家怎样在国难深重、兵荒马乱的时期，背负着一个民族的希望，只身远渡重洋去往异国他乡，克服语言、生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困难，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文化艺术，用他那充满美意令美国人着迷的艺术向西方和世界展现一个古老东方民族的真诚、善良、友好和智慧。

1941年10月，张书旂抵达旧金山并以此作为走进美国的立足之地。11月，他在南加州成功地举办了赴美后的第一个展览，由此开始了他在北美的巡展和讲学生涯。1942年春天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马不停蹄地穿行在北美的土地上，从芝加哥、纽约到加拿大的渥太华、多伦多，再到华盛顿、波士顿、堪萨斯。他的富有东方文化内涵和充满现代气息的绘画赢得了包括总理、诺贝尔奖得主、大学校长、教授、出版商、艺

术评论家、知名文化人等社会名流的由衷赞美，同时也受到美国和加拿大广大民众的热忱欢迎（图7）。1943年春夏，他往返于美国东海岸和中西部。1943年冬天以后，他则主要活动在让他倍感惬意的西海岸。波特兰、西雅图、洛杉矶、萨克拉门托，以及南加州海岸线上艺术家簇居的美丽小镇卡梅尔（California art colony of Carmel）和加拿大的温哥华等许多城市和郡镇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绘画伴随他的脚步，与美国各阶层人士见面。1945年到1946年间，他又去了美国南方的休斯敦、新奥尔良，接着再穿越中西部回到旧金山。

他在北美许多博物馆、美术馆、大学举办展览和讲学。包括加拿大的渥太华国家美术馆（National Art Gallery in Ottawa）、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温哥华美术馆（Vancouver Art Gallery）、威廉姆斯纪念



图7 张书旂向美国观众展示自己的作品